

发展质量比增长速度更重要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本报记者 陈学慧 李春霞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贡献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贡献大。

侧记

“老朋友”—— 斯蒂格利茨

李春霞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没有让人失望。顶着经济学家的耀眼光环，斯蒂格利茨所到之处，众人趋之若鹜。“斯蒂格利茨最有魅力的一点，是他会用最简单的语言阐释最复杂的经济原理，让人听起来就像是经济学的常识一样。”同为此次论坛嘉宾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这样评价。斯宾塞与斯蒂格利茨同时因“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荣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对斯蒂格利茨的采访可谓见缝插针“追”着跑。尽管在论坛开幕前就已预约采访，但斯蒂格利茨太“火”了，安排不出整段时间。于是，论坛茶歇成了最好的采访时段。斯蒂格利茨身材不高，年届七旬，但举手投足间透出些许孩童般的纯真。每一场分会结束，但凡有记者提问，他都待在原地解答，不厌其烦地回应每一个问题。兴致所至，他会抬高语调，边做手势边发出爽朗的笑声。斯蒂格利茨思维缜密，善于运用数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斯蒂格利茨著述颇丰。他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

近十年来，斯蒂格利茨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的研究。从2004年到2013年，连续10届，他都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参会嘉宾。十年参会，十次发言，他见证了中国从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其对中国经济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人们都愿意就中国经济问题请教他，而他的分析往往兼具前瞻性可操作性，被认为很“实”。

尽管学识渊博，但斯蒂格利茨仍不忘在论坛上学习别人的精彩观点。两天的会，除了登台发言以外，都能看到戴着耳麦认真听讲的身影。在午餐会和分会上的提问环节，他甚至去抢着提问，并引发热烈讨论。

本版编辑 祝惠春

联系邮箱 jrbchb@126.com

- 对世界经济前景作何判断
- 面对未来的愿景和挑战，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评价

世界经济将艰难前行

记者：中国学界的主流判断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会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的预测是，到2020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然不可能回到完全健康状态，尤其是高失业率问题。欧元区现在失业率高达11%，很多欧元区国家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5%，甚至达到30%。另外，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欧元框架缺陷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现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鲜

有进展，表现在，各国经济协调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储备机制并没有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进不明显。我们看到主权债务的结构重组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将长期困扰全球经济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复苏速度比较慢，欧洲区的复苏目前看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世界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风险，例如能源石油价格上涨、银行业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等。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很多国家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一些国家在危机前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再出现了。还有一些长期

的风险，例如发达财政金融监管机构现在正在收回财政刺激措施，美联储把利率保持接近零的水平，继续修复资产负债表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方面有很大的飞跃，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认为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我觉得未来最可能的情景是我们需要艰难前行。

记者：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哪些挑战？请您展望一下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的可能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应对全球性

危机的措施也应是全球性的。各国实行的经济刺激措施在全球产生影响，国内经济刺激措施和国际经济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投资会对邻国产生影响。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还不足够，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过度注重国内效应，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需求和国内供应上，而对国际需求和国际供应照顾不多。

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中国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区域以及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更多的资金能够专项用于新兴市场。

美国量化宽松存在50%退出的可能性。关于美国财政预算上限问题，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党因为迟迟不成协议而造成政府瘫痪的情况，未来美国不排除出现此类情况的可能性。

“ 各国经济协调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储备机制并没有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进不明显。

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方面有很大的飞跃，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

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中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区域以及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更多的资金能够专项用于新兴市场。

制造业基地向非洲转移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

过去30年中国不断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改革中摸索，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过去几年，中国的结构调整已在悄然发生，中国的政策不仅务实，而且更为均衡。

中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能沿袭西方的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单靠GDP数值来衡量，而是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挖掘新的增长点的关键。

助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建设

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方面中国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 但曾经的主导力量不会轻易放弃自身的地位
- 需要建立新的体系，如设立金砖国家银行
- 但要注意避免使现有多边合作体系边缘化
- 需要重新定义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 要与西方国家以开发资源为主的掠夺式关系有所区别
- 通过制造业基地转移带给非洲真正的发展机会

制图：夏一

开始建立人民币贸易结算机制，您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作何展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际储备货币依然以美元和欧元为主导，在欧美经济恶化的情况下显然有其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世界需要类似

特别提款权的合成储备货币，重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大势所趋。短期来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路还有待观察。从内部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不够，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够，政府对金融机构改革还处于试水阶段。从外部市场看，人

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一个相应的国际金融对接框架，这关乎各国的经济利益。但很多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的国家已经开始采用人民币来做贸易结算，美元也经历过这一阶段，因此，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很值得期待。

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良好平衡

记者：从2004年到2013年，您连续十年到北京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都会发表演讲。您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您在2004年第一次参会时就提出，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来调

节、平衡。您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评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作为经济学家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中国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初步显露出其特色。过去30年中国不

断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改革中摸索，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在提升福利水平，繁荣程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做得要成功。过去几年，中国的结构调整已在悄然发生，全要素生产率所占比重上升，劳动力贡献率下降，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

在下降。自由市场的观点在美国被广泛推崇，但也因此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过度的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策不仅务实，而且更为均衡。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的发展情况太特殊了，其仅用30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的经济成就，中国未来是什么样子？任何经济学家都不敢妄言。但我可以说，如果中国顺利实现改革转型，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举足轻重的一极。中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沿袭西方的发展模式。

结构性改革是持续增长的关键

口型转向内需型的发展模式，让人民分享更多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我想这是中国较其他国家来说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政府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加大公共投入，包括教育、建造宜居城市等。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剧，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正进入历史性转折期。我相信中国经济增速仍可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但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单靠GDP数值来衡量，而是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

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未必有效，需要作出转型。欧美复苏的艰难进程告诉我们，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挖掘新的增长点的关键。

另外还需要强调一点，继续维持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是要看质量。GDP不是很好的指标，因为它没办法评估生活的质量以及环境方面相应的代价。在新的发展模式之下，生活的质量、发展的质量更加重要。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一些基本层面的改变，更加转向内需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些机制性的障碍需要扫除，在金融行业需要更多的开放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记者：基于中国的经济现实以及全球经济的现实，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政策建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中国未来要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不能用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来代替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将经济发展靠出口拉动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发展服务型经济。第三，增加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参与度，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便利化机制，帮助创新型公司

拓宽融资渠道。第四，更重视环境、城市宜居化、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第五，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尤其是企业治理和公共治理水平。增加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投入，增加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和监督。第六，改革财税体制。具体来说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扩充税基，减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征税的重合之处、合理利用新的征税工具，例如二氧化碳排放税和资源利用税等。我相信，将现有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相结合，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虽然已经减少了对出口的依存度，但是贸易这一块还是比较高，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比较高，环境问题也是比较严重，还有政府治理的问题。中国要从出口型的经济模式转向消费型、服务型，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保证政府决策更加透明。